

趙蔚芝主編

稷下學宮資料彙編

山東教育出版社



# 稷下學宮資料彙編

趙蔚芝 主編

山東教育出版社

**稷下學宮資料彙編**

**趙蔚芝 主編**



**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**

**(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)**

**山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**



**850×1168毫米 32開 10印張 180千字**

**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**

**印數 1—2000**

**ISBN 7—5328—0864—5/G·716**

**定價：4.50圓**

**本書由趙蔚芝主編。參加者有：**

**王志民，負責收集《戰國策》中的有關資料；劉世友，負責收集《莊子》及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的有關資料；張英基，負責收集《韓非子》中的有關資料；其餘資料為趙蔚芝收集。**

**劉聿鑫為本書編寫借閱并復印參考資料多種。**

## 前 言

稷下學宮是戰國時代齊國統治者創設的一個帶有政治性的學術團體。它不同於一般的大學，而帶有研究院性質，近似今天的社會科學院。由于它設置在齊國國都臨淄的稷門之下，故名之曰“稷下之學”，通稱稷下學宮。

稷下學宮的創始，根據徐幹《中論》的說法，在齊桓公田午之時。桓公之後，經過威王、宣王、湣王、襄王，到王建時才逐漸衰息。它的發展過程，幾乎和田齊的國運相終始。其中宣王時代，是稷下學宮的鼎盛時代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的《田敬仲完世家》和《孟子荀卿列傳》中作了如下的介紹：

“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自如騶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子、慎到、環淵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為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是以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。”（《世家》）

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，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環淵、接子、田駢、騶奭之徒，各著書言治亂之事，以干世主，豈可勝道哉！……於是齊王嘉之，自如淳于髡以下，皆命曰列大夫，為開第康莊之衢，高門大屋，尊寵之。覽天下諸侯賓客，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。”（《列傳》）

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，當時稷下學宮的規模是巨大的。學士之多達到“數百千人”，單是受到優待的就有七十六人。這些學士，不限於齊國人，有些還來自其他諸侯之國，像上面提到的慎到是趙國人，環淵是楚國人。齊國統治者把他們延攬在一起，形成自己的人才優勢，組成自己的人才庫、智囊團。從介紹中還可以看出，當時稷下學士的待遇是優厚的。他們既享受着“列大夫”、“上大夫”的政治榮譽，又得到了住在“康莊之衢”“高門大屋”的經濟實惠。齊國統治者不惜高的代價使這些“賢士”受到“尊寵”。

齊國成立如此巨大的稷下學宮，尊寵如此衆多的稷下學士，目的不是只向諸侯之國炫耀自己的尊賢，而是讓這些學士更好地為齊國的政治服務。服務的一般方式是議政，即圍繞着齊國的富強提出應興應革的意見和建議。這種議政方式，有的是口頭的，這就是引文中提到的“不治而議論”；有的是書面的，這就是引文中說的“各著書言治亂之事”。他們口頭議政的材料，有些還保留在古代的典籍裏，本書收集的，有很大一部分是這種資料。他們議政的著作，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裏都有記載，可惜沒有完全流傳下來。服務的方式，除了議政之外，有些人還直接參政。突出的如淳于髡。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說：“威王八年，楚大發兵加齊，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。”《說苑·尊賢》說：“（齊王）立淳于髡為上卿，賜之千金，革車百乘，與平諸侯之事。”其次如騶衍。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裴駟《集解》引劉向《別錄》云：“齊使鄒衍過趙，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荼母子之屬，論白馬非馬之辯。”除了直接地議政、參政之外，稷下學士還承擔着為齊國統治者培養接班人的任務。“數百千人”的學士當中，只有七十六位先生受到優待，

其餘的大概是接受培訓的齊國未來的參政者、議政者。有人把稷下學宮說成是齊國的國立大學，就是據此而言。

如此衆多的學士聚集到稷下來，他們的思想觀點很難一致。在參政議政、著書立說的時候，往往各抒己見，展開爭論。在服務於齊國政治的前提下，齊國統治者不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，不干與他們的學術研究。因此，稷下學宮成為我國古代一處百家爭鳴的著名陣地。根據班固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裏的分類，稷下學士中有儒家，代表人物是孟子、荀子、公孫固、魯仲連；有道家，代表人物是環淵、(關尹)、田駢、黔婁、捷子；有陰陽家，代表人物有鄒衍、鄒奭、閻丘子；有法家，代表人物是慎到；有名家，代表人物是尹文；有小說家，代表人物是宋鈞。這個分類，除宋鈞外，基本正確。按照宋鈞的理論實踐，他應該歸入墨家；從《莊子·天下篇》宋、尹並提來看，他可能向名家轉化。這些流派成員，都是有著作依據的。另外，到班固時著作已經亡佚的稷下學士就難於歸類，著名的如淳于髡。從他的能言善辯來看，有人把他歸入縱橫家；從他的“學無所主”來看，似乎又該歸入雜家。先秦的九流十家，除了農家以外，在稷下基本上都具備了。這些學派，有的相互間展開辯論，有的在學派內部展開辯論。不同學派相互間的辯論，有的在學宮之內展開，著名的如淳于髡和孟子的辯論就有三次。一次辯論“嫂溺是否援之以手”，進而討論到援救天下的辦法，見于《孟子·離婁》；一次辯論“賢者是否有益於國”，涉及到名與實的關係，見于《孟子·告子》；一次辯論齊宣王是否知“善之為善”，涉及到了認識論的問題，見于《韓詩外傳》。不同學派相互間的辯論，有的也在學宮之外展開，著名的如鄒衍和公孫龍的辯論，就在趙國展開，據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說，“平

原君厚待公孫龍。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。及鄒衍過趙，言至道，乃絀公孫龍。”稷下學士的激烈爭辯，不僅出現在不同學派相互之間，也出現在同一學派的內部。如孟子與公孫丑、萬章之間的辯論，就是儒家內部師徒之間的爭辯（詳見《孟子》）；兒說“持白馬非馬也，服齊稷下之辯者”，就是名辯家內部的爭辯（詳見《韓非子》）。三為祭酒的荀子，在他的《非十二子篇》中，不僅批判了不同學派的它蠹、魏牟、陳仲、史鱗、墨翟、宋鈃、慎到、田駢、惠施、鄧析，而且批判了儒家的子思、孟軻。為了批判孟軻的性善說，他特別寫了《性惡篇》。這些批判，雖然不是當面的、口頭的，但他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。

郭沫若說：“這稷下之學的設置，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有劃時代的意義。……發展到能够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，這是社會的進步，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。”應該感謝田齊的統治者，為稷下學士開展學術思想的自由研究提供了方便；優厚的待遇，解除了學士們在生活上的後顧之憂；富強的國勢，為他們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；人才的聚集，使他們得到了取長補短的大好機會。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壯大的稷下學宮，成了古代齊文化的中心。百家爭鳴的齊文化，和由儒家獨占的魯文化大不相同。以孔子為首的魯文化，“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”，以“易、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”六藝為經典，繼承了我國古代的文化傳統。它雖然也經過後儒發展，但不能離經叛道，帶有很大的因襲性和保守性。齊文化則不同，各個學派著書立說，都根據形勢需要，發表自己的一家之言，雖然不盡有當，但都“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故”，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，具有很大的開拓性和進步性。身為儒家後起



大師的荀子，長期處在百家爭鳴的環境中，也取長補短，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修正以至改造。他的“法後王”的觀點；“禮表法裏”，寓法於禮的觀點；“實”為第一性，“實”決定“名”的觀點；“天行有常”，人定勝天的觀點；都閃耀着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輝。荀子的成就，標志着稷下學術思想的最高成就。

今天，我們正在黨的領導下建設四化，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；正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，貫徹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的方針；正在落實“尊重知識”、“尊重人才”的知識分子政策。這部《稷下學宮資料彙編》所收集的，雖然是古人古事，但在上述幾方面，它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鑑和參考，做到古為今用。由于編者限於水平，資料收集得很不完全；其中有些地方的徵引，難免出現錯誤。希望專家學者，提出批評與指正，

編者一九八八年元月五日

## 凡 例

(一) 稷下成員，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提出姓名的有九人，即孟軻(？)、荀況、鄒衍、鄒奭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慎到、接子、環淵；《漢書·藝文志》增加了宋鈞、尹文二人；錢穆《先秦諸子繫年考辨》又提出了彭蒙、季真、王斗、兒說、田巴、魯仲連六人。最近孫以楷的《稷下人物考辨》，還增加了徐刼、顏觸、唐易子、公孫固、田過、列精子高、匡情、告子、黔婁子、孔穿、能意、閻丘先生等人。上述這些人，除《史》、《漢》所述十一名外，其餘的人，有的和稷下先生發生過關係，有的只和齊國統治者發生過關係。作為資料搜集，本書的標準是寧寬勿窄，盡量把他們的有關資料都收集起來，讓研究者去鑑別篩選。

(二) 稷下著述，有的有專書流傳，注解甚詳，如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；有的原著散失，作品出于後人的依附偽託或搜集補綴，如《尹文子》、《慎子》；有的原著失傳或本無著作，思想言行為當代或後代作家記錄徵引，如魯仲連、淳于髡、彭蒙等；本書收集的資料，主要在第三類和第二類。至于流傳已久，注解詳細，易于購求的巨著，如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，一般不在收集之列。但雖系專著，篇幅短，不常見，為了便于檢閱，本書也破例收集進來，如《尹文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關尹子》。

(三) 資料收集，限於古代。時間界限，上起戰國，下至晚清。今人研究成果，原則上不收；其中有為收集原始資料提

供綫索者，亦適當採用。收集範圍：一為稷下學宮，包括其成立、發展變化、性質作用、地理位置等；二為稷下成員，包括稷下先生各自的思想、言行、生平經歷、著作流傳、社會影響等。材料來源，有的來自先秦諸子，如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等；有的來自秦以後的史傳，如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；有的來自大型類書，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文獻通考》等；有的來自各書的注疏，較多的如李善的《文選注》；對子、史中的資料，重要的也摘錄了其中的注解。就資料的分量說，唐宋以前的居多，唐宋以後的較少。

（四）資料編排，先稷下學宮，後稷下成員。稷下成員所屬思想流派，古代學者主張不盡一致，當今學者主張也不盡一致。如宋鉞，班固列入小說家，郭沫若歸入道家，馮友蘭則屬之墨家。再如慎到，郭氏和馮氏，既把他作道家論，又把他作法家論。再如淳于髡，《史記》說他“其學無所主”，郭氏說他“是一位無所謂派”，而有的研究者則認為他能言善辯，長于外交，把他列入縱橫家。這種情況說明，要把上述的稷下成員，全部妥善地按學術流派歸類是困難的。智者見智，仁者見仁，應該讓學者們開展研究爭論，去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。為此，本書對稷下成員，基本上按他們生活的時代先後排列。對每個成員收集到的資料，也按資料所在的著作出現的先後排列。不區分他們所屬的派別。

（五）資料異同，力求多說並存。稷下成員，有的名字不同，如田駢亦稱陳駢、田廣、田子；宋鉞又名宋輕、宋榮；鄒奭亦名鄒赫。特別如環淵，有玄淵、蜎淵、娟媛、范環、范蜎、便媛、便娟等多種名號。有的籍貫不同：如慎到，《史記》言“趙人”；《淮南子》高誘注云“齊人”；《中興館閣書目》



則曰瀏陽人。有的時間不同：如尹文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言，“說齊宣王，先公孫龍”；仲長氏《尹文子序》則言，“與宋鈞、彭蒙、田駢同學於公孫龍，公孫龍稱之”。有的身分不同：如慎子，《孟子》言魯欲以為將軍；《戰國策》言楚以為太子傅；《莊子》成玄英疏則以為齊之隱士。另外據錢穆和郭沫若的意見，環淵和關尹實為一人；據郭沫若和高亨的意見，《呂氏春秋》中的劑貌辨（《戰國策》作齊貌辨）和備說，就是兒說。這些或異或同的資料，有的已有定論，有的尚無定論，本書本着多說並存的原則，都把它收集進來。

（六）資料真偽，應該分辨。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收《公孫固》一篇，班固注曰：“齊閔王失國，問之，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。”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把這個公孫固，先誤為春秋宋襄公時的大司馬公孫固，再誤為漢初傳《詩》的齊人韓（應作韓）固。這樣的偽資料，古人已經辨明。再如《藝文志》中收錄的《捷子》二篇，班固注曰：“齊人，武帝時說。”從“齊人”判斷，這分明是稷下先生中接（古與“捷”通）子的著作；下面的“武帝時說”，乃因下文《曹羽》一條的“武帝時說於齊王”的注文而誤衍。這樣半真半偽的資料，古人也已經辨明。另外有的資料出於偽書，如“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”，見於《列子》；有的資料出現較晚，如“有暴子問於慎子”見於明莊元臣《叔苴子外編》，是真是偽，一時難定。還有像黔婁子的事跡，《列女傳》說成曾子時，《高士傳》說成魯恭公時，其中真偽雜糅，難以完全否定。為了便於學者研究，屬於上述情況的各種資料，本書全部收入。

（七）資料重複，盡量避免。資料的重複有兩種情況：一是收集的重複，二是編排的重複。本書收集的資料，如果原書

現存而且著錄的，徵引原書，不再重複，如關於《史記》中的資料；如果原書不存，或雖存而沒有記述的，則不避重複，如關於《慎子》、《尹文子》、《魯連子》中的資料。同一資料，見於不同著作，詳略不同，字句之間有差異，一般不避重複，如《戰國策》和《史記》對魯仲連、淳于髡的介紹。對稷下成員，本書以人為單位編排。而有關各成員的資料，各書記錄征引，有的分述，有的總叙。在歸類過程中，前者可避免重複，後者則難以避免。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、《莊子·天下篇》、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等篇提供的資料，都存在着後者的情況。

（八）本書所收資料，稷下成員多，稷下學宮少；成員中，淳于髡、魯仲連、慎到、尹文、鄒衍較多，其他較少。原計劃把古人對稷下成員的研究批判獨列一部分，感到不便於學者研究，又加此種資料收集不多，為了避免重複，都分別并入各個成員的有關資料中。

## 徵用書目

- 《墨子》（清孫詒讓《閒詁》）  
《孟子》（清焦循《正義》）  
《莊子》（清王先謙《集解》）  
《荀子》（清王先謙《集解》）  
《韓非子》（清王先慎《集解》）  
《慎子》（清錢熙祚校）  
《關尹子》（《百子全書》本）  
《尹文子》（清錢熙祚校）  
《列子》（晉張湛注）  
《管子》（郭沫若《集校》）  
《呂氏春秋》（漢高誘注）  
《戰國策》（漢高誘注）  
《左傳》（晉杜預注）  
《公孫龍子》（宋謝希深注）  
《孔叢子》（漢孔鮒撰）  
《淮南子》（漢高誘注）  
《韓詩外傳》（漢韓嬰撰）  
《尸子》（清孫星衍校集）  
《史記》（宋裴駟《集解》、唐張守節《正義》、  
唐、司馬貞《索隱》）  
《鹽鐵論》（漢桓寬撰）



- 《新序》（漢劉向撰）  
《說苑》（漢劉向撰）  
《法言》（漢揚雄撰）  
《漢書》（唐顏師古注）  
《論衡》（漢王充撰）  
《中論》（漢徐幹撰）  
《三國志》（宋裴松之注）  
《風俗通義》（漢應劭撰）  
《後漢書》（唐李賢注）  
《聖賢高士傳》（晉嵇康撰）  
《聖賢群輔錄》（晉陶潛撰）  
《抱朴子》（晉葛洪撰）  
《文心雕龍》（梁劉勰撰）  
《文選》（唐李善注）  
《世說新語》（梁劉孝標注）  
《水經注》（北魏酈道元撰）  
《晉書》（唐房玄齡等撰）  
《劉子》（北齊劉晝撰）  
《隋書》（唐魏徵等撰）  
《北堂書鈔》（唐虞世南撰）  
《羣書治要》（唐魏徵等撰）  
《藝文類聚》（唐歐陽詢等撰）  
《初學記》（唐徐堅等撰）  
《尚書正義》（唐孔穎達等撰）  
《禮記正義》（唐孔穎達等撰）  
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唐孔穎達等撰）

- 《周禮注疏》（唐賈公彥撰）  
《長短經》（唐趙蕤撰）  
《李太白集》（唐李白撰）  
《意林》（唐馬總撰）  
《舊唐書》（後晉劉昫等撰）  
《新唐書》（宋歐陽修、宋祁撰）  
《太平御覽》（宋李昉等撰）  
《廣韻》（宋陳彭年等撰）  
《太平寰宇記》（宋樂史撰）  
《資治通鑑》（宋司馬光撰）  
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》（宋司馬光撰）  
《崇文總目》（宋王堯臣等撰）  
《郡齋讀書志》（宋晁公武撰）  
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宋陳振孫撰）  
《通志》（宋鄭樵撰）  
《子略》（宋高似孫撰）  
《漢藝文志考證》（宋王應麟撰）  
《宋史》（元托克托等撰）  
《文獻通考》（元馬端臨撰）  
《齊乘》（元于欽撰）  
《宋文憲公全集》（明宋濂撰）  
《嘉靖青州府志》（明馮惟訥撰）  
《叔苴子外編》（明莊元臣撰）  
《風雅逸篇》（明楊慎編）  
《古今偽書考》（清姚際恒撰）  
《池北偶談》（清王士禛撰）

- 《皇華紀聞》（清王士禛撰）  
《方望溪集》（清方苞撰）  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清紀昀等撰）  
《文史通義》（清章學誠撰）  
《鄒卿別傳》（清胡元儀撰）  
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（清馬國翰輯）  
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（清嚴可均輯）  
《書目答問》（清張之洞撰）  
《漢書藝文志拾補》（清姚振宗撰）  
《漢書藝文志條理》（清姚振宗撰）  
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標注》（清邵懿辰撰）  
《清史稿》（趙爾巽等撰）  
《臨淄縣志》（民國九年本）  
《中國叢書綜錄》（上海圖書館編）  
《淄博市文物志》（1984年淄博市文化局編）